

两性之维的符号学建构：评尤施卡 《性别符号学》

陈文斌

作者：达琳·尤施卡 著 程丽蓉 译

书名：性别符号学 政治身体/身体政治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 年

ISBN：9787544752244

DOI：10.13760/b.cnki.sam.201502017

在性别/性的概念上，存在着自然属性和社会建构两种考察思路。前者从生物学的角度解释男女生理上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存在的原因；后者认为人类自身构建了性别这一范畴，从而将男性与女性相区别。在 20 世纪后半期，作为社会属性的性别研究伴随着西方社会运动和思潮所引发的对既定概念的质疑得到进一步发展，性别划分中的政治权力成为关注的焦点，女性与男性之间不平等地位得到重新考量。以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为代表，身份问题的考察试图揭示意识形态机器的运作，女性主义试图从男性话语建构的世界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将自己的身体从被压制的处境中解放出来。以往的性别研究涉及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等学科，而尤施卡是“运用符号学和系统分析方法来研究性别/性的”（尤施卡，2015，p.13）^①。她将意义理解为是语言所建构的，而性别/性又是意识形态的，处于政治话语中的性别/性同样是被建构起来的，这样的大致思路使得她在讨论性别时始终在思考意义的生成、传递和累积，利用符号学的系统分析方法，尤施卡建构了属于自己的分析模式，将性别/性的产生、发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纳入考查范围，在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模式中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

^① 后文仅随文标注页码。

一、性别/性符号体系的建构

对于性别与性的关系，尤施卡并没有将两者区分开来，她既“赞同将性看成是由社会历史所决定的范畴”，同时又认为“性别是社会范畴，它优先于性，性建构于其上”。（p. 212）而以往论者往往将性别与性区分，在这类论述中，“性被理解为是恒定不变的，而性别则被理解为是根据社会文化和历史参数而变动不居的”（p. 40）。这种差异表明，性别/性都是社会所建构的，而建构的方式依托于三种代表性叙事，借助于三种语言工具，在三个领域发挥作用，这种三分对应的体系形成了性别符号学分析的模型。同时，三者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有能够形成互动的意义协调机制，性别与性在这个体系中又能够进行层次划分，从而在整体三分的论证思路下搭建起性别符号学的体系。

总体而言，符号—象征、神话、仪式这三者代表性叙事对应了“形而上学”、“社会的”、“生物学的”三个领域，此外，借助于三种语言工具又形成了“三—三”的联系：提喻将符号—象征与形而上学联系在一起，隐喻把神话与社会联系起来，转喻将仪式与生物学结合起来。厘清了三者之间如何对应后发现，其内部又有一层关系：“社会领域中的性别、神话和隐喻是生物学领域（因而是性、仪式和转喻）和形而上学领域（因而是符号—象征和提喻）的源头。”（pp. 41—42）这样，神话成为仪式和符号—象征的中介，其本身通过与两者的联系获得了权威性和真实性。

具体而言，在生物学领域，仪式区分了雌性和雄性，例如多贡人通过环割礼仪式结束孩童的双性时期。而多贡人的割礼行为又是来源于神话：多贡人的神话认为白蚁山的存在使得男性造物神无法与大地发生性关系，为克服这一障碍，造物神斩断白蚁山才实现性结合，这样的结合使得叫拉末的男女双胞胎诞生，雌性灵魂位于雄性的包皮中，雄性灵魂位于雌性的阴蒂处，割礼移除了相反的气质。这样，神话和仪式就相互支撑。同样，符号—象征又依托于语境的作用。符号—象征要从社会领域中产生，就要经过仪式的作用获得形而上学的地位，从而能像普遍法则一般为人们所接受。尤施卡通过大量人类学的例证说明了三者之间的贯通，使整个符号意义的作用变成了动态的生成过程，为下文不同侧面的实证性思考奠定了理论考察的脉络，同时也暗藏了一个内在结论，即性别/性意识形态并非固有的，而是被构建的。

二、性别符号学的“冒险”

作者自言性别符号学是她的一次冒险。笔者看来，冒险之意既指文本本

身的写作困难和挑战,同时又是指文本内容试图突破成规的冒险。传统的理论书籍将过多的篇幅放置在理论的建构上,配以适当的例证诠释理论的深意。符号学本身作为形式论的集大成就很典型地体现了学理的清晰,但《性别符号学》试图摆脱纯粹理论的构建,而是在阐发清楚一个体系之后就回到大量文本中,借助不同的文本切入不同的论域,对象文本既有经典的《荷马史诗》,又有后现代小说;既考察了古罗马角斗士,又能够联系美帝国神话的构建;既能够大量借鉴以往论者的成果,又会对符号学已有理论进行反思、批判和创新。对象文本整体上也形成了一次冒险,这场冒险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突破了纯粹理论框架的桎梏,在生动的文本解读中,将性别/性意识形态的分析贯穿其中。

在对安吉拉·卡特的小说《英雄和恶棍》、《霍夫曼博士的恶魔欲望机器》的分析中,尤施卡解读出神话中潜在的二元论,并分析了二元论在性别/性符号系统中扮演的角色。野蛮/文明、女性/男性、非理性的/理性的……“二元中的双方是通过与对方对立而获得意义,且在这种对立中又是关联的”(p. 54)。而卡特的作品恰恰是对这一本质对立的质疑,作品中的人物也试图对这种神话进行抗争,文本的分析验证了主体是被建构的这一事实。延续着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猎物/猎手”模式典型地存在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男性气质恰恰是通过充当猎手来实现的。将作为战士的男人视为主流男性气质的表征,为集体牺牲自我的英雄叙事被灌输进士兵的头脑,而女性作为对立面恰恰成为被猎者。投入战争本身就是一个仪式化的过程,古代和现代战争就是利用这种英雄悲剧叙事驱动了男人。

在其后的文本分析中,尤施卡将身体作为考察的重点,以着魔和驱魔为中心,分析不同性别的仪式化表演。女性身体被视为是多孔的,因而容易受到恶魔的侵袭,男性一旦沾染了女性气质也会成为受攻击的对象。“着魔和驱魔、巫术和惩罚从一开始就是性别/性编码的”(p. 108),其中渗透着意识形态合法化的路径。在这种观念的形成过程中,女性身体成为国家和教会试图控制的东西,在控制的历史中,性别/性显示着历史变迁的痕迹,借助于神话、仪式和符号—象征,女性的身体被男性垄断。

符号—象征同样作用于男性身体从而言说着性别/性。尤施卡利用古罗马的角斗士现象解释了现代世界性别/性是被如何编码的,罗马帝国和美帝国被放置在古今的象征性照应中。古罗马斗兽场的圆形剧场构造体现了权力话语的安排,座位即按照阶层和性别/性分等级。皇帝与角斗士分别处于社会的最顶端和最底端,后者象征了失控的男性气质,从而在放纵方面与女性性别归为同类。

但有意思的是，作者有意将古罗马与美国相联系，从而在解读电影《角斗士》的过程中，挖掘出其中潜在的叙事策略，揭开了电影中的现代神话。

《性别符号学》开掘了不同文本和现象中的性别/性意识形态的产生和运作。正是在内容的冒险上，第一章构建的性别/性符号学体系融入文字文本、宗教仪式和现代政治中。这场冒险目睹了历史与现实的交杂，在貌似无关的现象之中剖析出了性别/性意识形态是如何在各个层面渗透的，正是在繁多的文本现象中，体会到性别符号学所建构的三者互动图的运作机理。

三、符号—象征理论的动态生成观

在《性别符号学》的末章，作者“暂时告别了性别符号学”（p. 178），试图通过解构伊利亚德范式重新诠释符号—象征与圣像之间的关系，并从中搭建三级层序符号。这场理论创新不得不面对两个挑战：一方面，已经有诸多知名学者展开关于象征和象征理论的研究，其中包括苏珊·朗格、恩斯特·卡西尔、米尔恰·伊利亚德、罗曼·雅各布森、罗兰·巴尔特、翁贝托·艾科等，如何处理前人的成果并体现自身理论解读的有效性和创新性成为首要难题；另一方面，罗兰·巴耳特的二级层序符号理论本身就内在包含着继续延伸的可能，尤施卡实现了三级层序符号的搭建，但这种搭建本身沿用了能指与所指的符号表意模式，所以这场理论创新的“冒险”可能受制于已有模式的约束。

《性别符号学》在这两个层面上都迎接了挑战。尤施卡首先辨明了研究象征符号的两组角度，“以伊利亚德为代表的第一组，倾向于关注自然和语言两类象征符号，并且通常认为宗教符号是自然符号”（p. 180），而“第二组理论家致力于符号学领域，他们并没有做以上划分，而是将象征作为符号来研究”。正是在两种路径的区分下，尤施卡站到了符号学这一边，明确了自己分析的立场。在尤施卡看来，伊利亚德对于象征的理解构成了一种误导，即“符号—象征被认为代表了某种潜在且永恒的现实的真相，而不是当下信仰和实践的社会历史系统，符号—象征于其中发展而来”（p. 194）。而尤施卡的三级层序符号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暗合了无限衍义的可能。一个符号本身可能具有多重意义，每一个意义又能引发新的意义，这样整个意义世界也就处于更新和动态之中。由此来看，尤施卡借助于对圣像生成的分析实现了符号意义的解放，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性别符号学》搭建的性别/性符号体系保持了这一互动性，性别/性意识形态也处于意义流动之中。这种反本质主义的立场打破了对性别/性概念僵化的理解，将性别/性放置在历史与现实之

中考察，从而还原了其被遮蔽的面纱。

四、结语

符号学是意义学，“是研究意义活动的学说”（赵毅衡，2012，p. 3）。性别/性问题自发现以来就成为分析和讨论的重点，这一问题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政治当中，被权力话语所渗透。人的身体承载着性别/性，成为被施加权力的对象，因此政治和身体又不可避免地被绑定在一起。按照福柯的分析，权力无处不在，同样的，意义也无处不在，只要存在人的意识，对于意义问题的探讨也不会绝迹。性别/性符号学的建构和发展将意义问题的研究转回到人本身，关注人的身份和身体，考察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如何处理性别/性，探究性别/性意识形态如何生成并发挥作用。尤施卡的《性别符号学》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读，在三分的体系构建中贯彻了意义动态生成的理念，在对历史和现实的考察中将性别/性看作无处不在的意义问题，也恰恰是这种融通的视野，从不同的侧面阐明了性别/性如何在被人建构的同时又影响着人自身。

回溯古典时期的玛雅文明，在有关人类创造的起源神话中，最初出现的四个人是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相混合的。在这种遥远的追溯后，现实社会的性别/性意识形态已然存在并发挥着作用，“社会结构借助于神话、仪式和符号—象征这些代表性叙述而使之理性化、公正化、合法化，使之变得‘真实’，通过社会的、生物的和形而上学的领域使之得以应用，运用隐喻、转喻和提喻这些语言工具赋予其意义”（p. 218）。《性别符号学》始终贯彻着性别/性符号体系中的三分法，实证性地解读了性别/性的诸多意义问题，实现了颇多的创建，但意义问题的分析和讨论还将深入下去，新的诠释也将在符号学诸领域的互动中继续开掘出新的天地。

引用文献：

- 尤施卡，达琳·M.（2015）. 性别符号学（程丽蓉，译）. 上海：译林出版社.
赵毅衡（2012）. 符号学.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陈文斌，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员，研究方向为主体符号学。

Author:

Chen Wenbin, member of the ISMS Research Team. His research field is subjective semiotics.

Email: dgsy@sina.cn